

劉子健與臺灣早期人文學術發展

James T. C. Liu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Scholarship in Taiwan

黃寬重 (Huang Kuan-chung) *

一、前 言

劉子健教授（1919-1993）是國際宋史學界影響力最顯著的學者之一。他除在研究、教學均有卓越表現外，具宏觀視野、優異的中、日、英語，及溝通、協調能力。他於青壯之年來臺，以其卓越的研究能力與視野，對臺灣早期人文學術，特別是史學研究的成長扮演重要推手，尤其在推動國際化上，諸如促成史丹佛語言中心在臺大的設立，讓臺北成為歐美學人學習華語的基地；又結合宋史同道，籌辦宋史座談會，成立具特色的學術組織，為臺灣宋遼金元史學界提升研究能量，並推動國際交流合作。同時通過教學開展臺大學生視野、強化研究能力；以及協助宋史同道向基金會申請編纂索引及出版重要史籍，對提升臺灣宋史研究的國際地位，扮演開創性角色。他在中央研究院訪問期間，更協助近代史研究所爭取國際資源，幫助王世杰院長推動中美人文社會會議，促進中美人文社會科學界之合作，而在參與過程中則見證中研院人文組學術方向的改變。

劉教授來臺時間雖短，但個人的才學與努力，不僅啟迪、獎掖後學，更具體提升臺灣人文學術，及宋史研究的發展，乃至在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上，貢獻卓著，是協助臺灣早期人文學術成長及國際化指標性的學者。可惜因長年旅居國外，相關書信資料蒐集不易，以致辭世迄今，僅見片段追憶，難以較完整掌握他早年在臺灣參

與學術活動的事蹟及具體貢獻。

我因受劉教授的啟發，致力南宋史研究，也有緣從他口中，略知其對臺灣宋史研究成長付出的心力及貢獻，乃結合他留存的口述歷史、相關書信及學界領袖的日記，針對他參與推動臺灣早期人文學術發展的具體事蹟，分項介紹，期有助於認識他協助臺灣發展的角色及貢獻。其中有關宋史座談會部分資料豐富，可討論的範圍較廣，擬另撰專文；至於他協助郭廷以提升近史所研究能量的部分已發表於期刊。本文謹參照相關文獻，對史丹佛語文中心的成立、參與臺大歷史教學、中央研究院人文學術活動及與史語所的關係等事務，進行綜合性介紹，以瞭解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

二、籌辦史丹佛大學語文中心

劉子健教授和臺灣政、學界的直接連繫，始於 1961 年代表美國史丹佛大學來臺大訪察籌辦中國文化研習中心，即眾人熟悉的史丹佛語文中心。該中心不僅為美國學界學習華語、研習中華文化，開闢漢學研究的基礎，對開展、深化臺美學術交流合作有很大的貢獻。此行也是劉教授協助臺灣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提升研究能量的開端。但由於語文中心成立後，劉教授擔任顧問未負責實質職務，僅見該中心及部分媒體留下少量他參與籌辦的報導資料，且內容簡略，以致他參與中心成立的過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程與影響，鮮為外界所知。本人偕好友黃清連、朱鴻林於 1986 年訪談他的學思歷程時，針對史丹佛大學到臺北籌設語文中心的過程，所談及的部分內容可補文獻記述之不足。乃彙整口述內容、相關報導及郭廷以日記所述，為他參與籌辦史丹佛語文中心的事蹟，留下記錄。

1960 年以前，美國高校學界中除康乃爾大學外，鮮少研習華語及漢學單位。1960 年當劉子健教授從匹茲堡轉任史丹佛大學時，正逢該校在東京成立日本研究中心，因劉教授精通英、日文，乃受邀參與相關事務。

1961 年，史丹佛大學為強化華語教學及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擬成立中國語文研習中心，乃著手規劃選地。是年 5 月 14 日由中國研究中心勃魯克 (E. Howard Brooks) 教授率領三位專家，組團由東京到臺灣、香港二地訪問，實地掌握教育情況及支持條件，供選址參考。

選址考察團返校後，初步認為不論生活條件與免稅措施，香港均較具優勢；但教務長不認同，他以為香港講廣東話不利華語教學，遂決定派勃魯克、倪文森及劉教授再訪二地。這時處境窘困的國民政府，亟欲擴展國際關係，開展學術交流，對史丹佛大學選址一事甚為重視，5 月 28 日曾由教育部與財政部研商一項優待專法，¹ 並由當時的財政部長嚴家淦致函史丹佛大學校長 J. E. Wallace Sterling 說明政府提供史丹佛中心設備進口優惠事宜。² 同年 10 月陳誠副總統也將私人收集 1 千 1 百多件 20 世紀 40 年代初中共活動的重要文獻，贈與該校胡佛研究所。³ 一連串的措施，表達政府積極爭取的決心。

1962 年 3 月中旬勃魯克、劉子健與尼威森（倪文森）三人先到東京了解日本中心的情況後，於 17 日抵臺北。此行受到政府及教育界盛大的歡迎。五天後訪問團轉赴香港訪察。三人返校後，咸認為臺北優於香港；劉教授更指出無論宿舍、設備、教員各項條件，臺大均具優勢，是研習中心的理想場所，建議和臺大錢思亮校長洽商合作，遂決定在臺大成立研習中心。錢思亮校長並致函勃魯克教授，以象徵性一美元租金借教室給史丹佛中心。⁴ 選址定案後，勃魯克教授回任本職，由劉子健擔任理事會主席，尼威森任主任，共同籌劃中心成立事宜。⁵

5 月 3 日，史丹佛大學正式宣布在臺北設置中國研究中心，將於 9 月 1 日揭幕。這是該大學繼西德、法國、義大利及日本之後，第五個在美國以外的校區，設於臺灣大學校區內，特別著重研究高級中國國語的大學本部及研究部學生的訓練。校址確定後隨即展開規劃籌備；錢思亮校長請文學院沈剛伯院長負責與劉教授研商具體方案。原擬商借剛落成的新生大樓為中心校址，後改由史丹佛自費整建化工大樓。劉子健於選定丁愛博為主任後，致函教育部長黃季陸，請其協助辦理入境手續。黃部長於 6 月 26 日函覆劉教授，表示已洽外交部迅速辦理並致歡迎之意。劉教授並與丁愛博商議學校中文名稱。⁶ 7 月 27 日倪文森主任來臺，正式命名為「史丹佛大學中國文化研習聯合所」，聘臺大教授董同龢為顧問，⁷ 並宣布新任主任狄安將於 8 月 13 日來臺。⁸ 狄安即丁愛博，曾於 1956 年在師大語文中心研習中國文化二

1 《聯合報》，1961 年 7 月 25 日二版。

2 陳立元，〈皇冠上的寶石〉，https://liberal.ntu.edu.tw/web/news/news_in.jsp?dm_id=DM1700106352137&np_id=NP1741671418099，截取日期：2025 年 8 月 14 日。

3 《聯合報》，1961 年 10 月 19 日四版。

4 同註 2。

5 黃清連，〈追憶半賓居士的治學與處世〉，載於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 14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頁 5。

6 同註 2。黃部長函文見該文附圖五。

7 《聯合報》，1962 年 7 月 26 日二版。

8 《聯合報》，1962 年 7 月 29 日三版。

年，太太是臺灣人。⁹月1日，有14個學會在臺北賓館舉行茶會，接送二位主任。911月2日史丹佛中心正式在臺大成立，成為此後造就眾多精通中文與華人文化的政、法、商界，以及學界的研究與從業人才，對臺美關係有顯著貢獻與深遠的影響。

研習中心籌備期間，劉教授與尼威森教授分任理事會主席及主任，主要任務是建立組織運作、尋求合作對象、爭取資源及延攬人才，其中尋求合作學校及向基金會爭取經費尤為劉教授的主要任務。初期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無意參加，而哈佛大學和柏克萊大學因獲楊聯陞教授和陳世驥教授協助，爽快答應，遂得以向福特基金會申請資助。獲得福特基金會支持後，耶魯與哥倫比亞大學轉而參加，為此，福特基金會更增5萬美金。由於參與學校增加，遂決議組成跨校的聯合理事會；劉教授提議理事會由其他成員學校組成，負責監督，史丹佛則實際執行運作。雖有人表示疑慮，劉教授卻認為各有專責，不致相互掣肘；結果運作並無困難。等丁愛博到職後，劉教授曾於當年12月下旬，再訪臺北，視察語文中心的組織運作及訓練情況，¹⁰隨後即轉任顧問，不參與實際工作。

劉教授擔任理事主席的職務約僅半年，但在他的主持下，史丹佛語文中心的組成運作及發揮的影響力，都讓他相當滿意，因此次年到史語所擔任訪問學人時，在履歷表上填寫「主催者」，及「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研習所理事會主席」，¹¹說明他對曾任此一角色甚為重視。

1962年劉教授二趟短暫的臺灣行，既對臺灣開展漢學研究及華語教學國際化發揮影響，也讓他結識眾多臺灣政學界重量級人物，更重要的是他的學識視野與擅長溝通的才華被發現，遂讓他在接著來臺研究的一年間，除了致力專業研究外，更得以協助臺灣學界深化研究，

在推動國際合作交流，充分展現長才，貢獻力量。

三、劉子健與臺大歷史系

1962年3月17日劉子健和二位同事到臺北考察，是他第一次訪問臺大，停留時間大約二週。此行他當與包括沈剛伯、姚從吾、董同龢、余又蓀、許倬雲在內的臺大教授見過面，但除了沈剛伯外未見紀錄。不過，當年12月25日劉教授再訪臺北時，在郭廷以的宴會上，又與姚從吾、董同龢教授見面。此時，他對臺大與中研院的學術環境，已有相當瞭解，因此對郭表示希望於1963年夏天到臺北研究，隨即向史語所申請為訪問學人。

1963年5月劉教授偕妻、女到臺北，入住中研院蔡元培紀念館，在史語所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並開展與臺灣人文及宋史學界交流。其中應臺大歷史系主任余又蓀之邀，至該系授課，遂與歷史系的師生有密切的互動。

劉子健在臺大歷史系授課的情況，時任助教的王德毅以及大四學生張元印象深刻。但對於課程的名稱，二人的記憶卻相當模糊，王教授指為「宋史專題研究」，主要在介紹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張教授則稱「開了一門專題研究之類的課程」，依稀記得劉先生介紹域外中國史研究與學說，特別是偏重日本學者的成果。¹²其實這門課的名稱是「國外史學討論」，是當年大四的選修課，由劉教授與系主任余又蓀教授聯名開設。余教授在1965年10月16日給旅居美國的袁同禮教授的信中說：「本年度劉子健先生來台研究一[年]，共開設「國外史學討論」一科，實際由彼主持。凡到臺之外籍學者均約請輪流參加。現已舉辦三周，該可收良好『學術交流』

9 《聯合報》，1962年9月1日二版。

10 郭廷以著，陸寶千、張朋園、魏秀梅點校，《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1962年12月25日，頁371；1963年1月2日，頁373。該書以下簡稱《郭廷以日記》。

11 參見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刊行會編，〈劉子健博士略歷〉，收入《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東京：同朋社，1989），頁9；並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秘書室人事舊檔02/27。

12 張元，〈學問道路指引前行的劉子健先生〉，載於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14輯，頁20-25。

之效。」¹³ 張元教授對劉教授與這門課的印象深刻，說：「吸引了許多學生，一間大教室幾乎坐滿。我也不落人後按時旁聽。」後來，許倬雲先生跟他說，劉先生希望找幾個年輕人談，「這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於是張元借助教王德毅、同學李榮村及楊姓學長同到椰林樹下聽劉先生開講。劉先生送每人一本剛出版的《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事後，劉教授還特別約張元到南港史語所參訪，詳細告訴他讀書為學之法；此行讓張元覺得「既像上了一門史學方法課，又能得到什麼武林秘籍，功力即刻大增」，這二次晤談對張元的研究與教學，有深刻的影響。

當時王德毅教授剛由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回臺大歷史系任助教。他對宋元典籍史料十分精熟，因此受劉教授之請，幫忙查書、借書，也成了課堂上的旁聽生。¹⁴ 由於這段機緣，加上王教授協助趙鐵寒教授處理宋史座談會的庶務，二人遂在此後三十年間成為摯友，時常透過書信，討論宋代史籍及研究議題。現存劉教授致王教授的信件即達三十多封。如 1965 年 7 月 13 日信中即對余又蓀主任的驟逝深表哀悼。同年除夕的信，則介紹索引的重要及製作方法，並建議用羅馬拼音編制卡片，以利國際化。1967 年 9 月 29 日的信中，劉教授談及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二年來近況，並代向歷史系諸友問候。此後王教授申請多項基金會資助，乃至赴普林斯頓進修，都得到劉教授協助與推薦；關於二人的學術情誼擬另文討論。

劉教授在臺大期間，除了授課，也推動二件在教學與學術交流有意義的事。一是許倬雲教授受到劉教授協助，取得美國歷史學會專題手冊，開啟學生學史方法；¹⁵ 其二則是姚從吾教授受劉教授之助，致函劉的老師洪業教授，並致贈《蒙古秘史新譯》中文初稿，託洪

教授轉請哈佛大學蒙元史教授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指教。劉子健建議雙方以後不妨以各自的文字提出議題，交換意見，以節省時間。這封促成雙方學術交流的信，是 1964 年 2 月 21 日姚教授撰文留底後於次日寄出。姚在存底的後面附了相當詳細的附記，談到劉的協助。¹⁶ 劉教授返美後，則透過趙鐵寒向姚教授問候，也請趙教授轉達，期望透過長者指導，由學生編寫書目；但也指出宋晞與香港余秉權都進行相關的工作，盼毋一事重複製作。¹⁷ 可見劉教授在臺大一學期的授課，除對學生方法、視野的開展有影響外，與歷史系的教授也有實質互動與協助。

四、見證中央研究院人文學術發展的轉變

劉教授到史語所訪問期間，正值中研院開展與美國人文學術交流、合作的重要時期。他憑藉其長才在複雜的人際關係與立場之間折衝協調，對中研院早期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合作，提供具體的建議方案；最初是協助郭廷以推動微卷攝製、募集基金充實史語所和近史所研究資源，繼之則參與王世杰院長籌組中美科學合作會議，特別在人文社會合作計劃等方面，擔當溝通協調的角色。而在推動這些計劃的過程中，也讓我們看到當時臺灣乃至中研院複雜的政治環境、微妙的人際關係，及中研院人文學術調整發展方向的實況，因此從他參與的過程，也見證中研院人文學術方向的轉型。由於他幾未留下資料，是以學界幾乎遺忘他的角色。本文透過郭廷以所長和王世杰院長的日記，及許倬雲等人的回憶錄所留存的資料，來勾勒他參與的事蹟，既見識到他的能力、真誠謀事的胸懷，相信也對中研院人文學術發展的轉

13 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23），頁 299。亦見於〈臺大歷史系 52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

14 王德毅，〈悼念劉子健教授〉，未刊稿。

15 陳永發、沈懷玉、潘光哲訪問，《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3），頁 268。

16 姚從吾，〈致洪業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17 1964 年 11 月 27 日致信，12 月 4 日姚收到。劉子健，〈致姚從吾書〉，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變，有更多的瞭解。

其中，他協助費正清籌謀募集基金，資助史語所和近史所的過程，在〈劉子健與近史所創立者郭廷以的關係〉一文已有相當篇幅的說明。¹⁸不過，由於此事涉及王世杰院長的態度，又與王院長籌組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計畫相關。因此本文仍述及相關部分，以明其變化。

(一) 講座案的源起與中止

費正清是講座案的發起人。他為哈佛大學教授，著作等身，在美國與國際學界卓有聲譽；和臺灣學、政界的關係十分複雜，一方面與學界大老胡適、李濟、蔣廷黻、郭廷以等人關係密切，積極推動、協助臺灣充實學術資源，另一方面則對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多所批評，為此常遭來部分政、學界人士的攻訐，更將與他關係密切的學者視為共黨同路人；他在臺灣政、學界是受爭議的學者。胡適在院長任上，雖也因與費正清的關係遭致批評，然尚不嚴重。王世杰繼任後，則有微妙的變化。王世杰是法學泰斗，長期從政，對政治甚為敏感，任院長後雖與兩蔣父子刻意保持距離，但為維護權位，也不願與具爭議者如費正清有過多接觸。

1964年3月21日，費正清和夫人來臺訪問一個月。郭廷以為安排費的此次行程，曾費心尋求蔣經國與忙於籌備中美科學合作會議的王世杰支持，均不順利：蔣既不願接見，王也僅禮貌性宴請，不讓費入住中研院；郭只得提供近史所研究室，以便費與研究同仁接觸。費對此一政治環境與氛圍，了然於心；劉子健則從中協調、傳達意見，包括向郭轉達費對近史所青年同仁印象深刻，將盡力協助；¹⁹費也與劉子健、李田意向郭

建議聯絡在美學人中，與中研院有關係者，形成一種組織，俾對史語所、近史所有所協助。²⁰4月13日費與郭廷以談到此行觀感時，認為臺灣學術研究和經濟發展均有明顯進步，並明確表示對於中央研究院的肯定，尤願盡力協助近史所及史語所，「盼能為兩所募集美金百萬元作為基金，使工作得以長期順利進行。」²¹這是費首次具體提出募款的數目與方案。郭廷以對費的講話甚為興奮，15日即赴南港，約劉子健、李田意商量；三人盛讚費募集基金的熱心，並期望技術性的問題，先和主持中華教育基金會的駐美大使蔣廷黻溝通，並請他協助。17日費正清又與郭廷以討論中美合作研究中國史問題。²²此時，正逢蔣廷黻返臺述職，²³且與郭廷以約好見面。4月18日郭陪蔣到南港途中，提及費正清擬籌募基金的計劃。中午費、蔣二人在近史所餐會上，討論近史所研究問題，蔣表示近史所缺的是經費，費即表明擬在美國募集基金的計畫，蔣甚表贊成並願意由中華基金會協助。蔣離開南港後，費又與郭續商進行步驟及方案，目標為一百至二百萬美元。²⁴19日費正清離臺前，特別和李濟詳商基金事務，並向郭表明赴東京後起草計劃，請郭、李二人續行商議。²⁵可見費正清在離臺一週內，即明確提出籌募計劃，而且分別與郭廷以、蔣廷黻、劉子健、李田意及李濟等人討論籌劃。5月7日郭廷以收到費從日本寄來的計畫書，²⁶顯示他肯定並支持史語所和近史所追求學術成長的熱忱，絲毫未因政界對他的冷淡有所影響，這讓李濟和郭廷以都深受感動。看來，只需要循行政程序上報院方，獲王院長支持並與蔣廷黻續商具體方案，即可順利執行；整個計畫似乎是水到渠成之勢。

不過，從王世杰對費正清來訪的態度，讓郭廷以感

18 黃寬重，〈劉子健與近史所創辦人郭廷以的關係〉，《古今論衡》44（2025.6）：17-27a。

19 《郭廷以日記》，1964年4月9日，頁482

20 《郭廷以日記》，1964年3月25日，頁479。

21 《郭廷以日記》，1964年4月13日，頁484。

22 《郭廷以日記》，1964年4月15日、4月17日，頁484-485。

23 《郭廷以日記》，1964年4月3日，頁481；4月12日，頁484。

24 《郭廷以日記》，1964年4月18日，頁485-486。

25 《郭廷以日記》，1964年4月19日，頁486。

26 《郭廷以日記》，1964年5月7日，頁490。

覺到需要費心溝通，因此郭於接到費的計畫書，及劉子健自日返臺後，再與李濟交換意見。5月11日王院長於院會後，找李、郭二人商議費正清的計畫。二人感於王對情況未充分掌握，分別向其說明，初步認知王並無異議。接著劉子健與李濟長談，並向郭廷以表示，李濟相當高興郭對他的尊重。²⁷ 次日王院長約劉子健商量在美募集經費，設立講座以強化史語所、近史所人事與工作的事。事後劉向郭說明已將費正清籌款計畫詳細向院長報告，王頗滿意。²⁸ 然而王院長卻在日記中提及李濟不滿近史所。²⁹ 5月14日，郭與李再商費正清募款計畫，咸認為可行，又約見劉子健，三人意見一致，遂與王院長詳商。此時，王院長則認為由費正清出名會有政治上的顧慮，也涉及擴大補助範圍。經他們說明，王始無異議。李濟表明二所願充分合作，且將來在美進行時以第三者經辦，不正式牽連中央研究院。「最後決定由李濟以及余（郭廷以）函覆費正清，贊同試探」，下午郭再與劉子健商量，³⁰ 似已朝正面發展。

但實情卻非如郭、李所料。王院長在5月14日的日記中記下「余對費正清出面發起一點，殊認為不安；對於其提議亦認為不妥」。³¹ 此後到5月26日李、郭、劉三人分別與王院長協商，也頻繁交換意見。這方面除5月14日外，王亦於17、22、23及26日記下他與李濟討論重點，坦言自己有意向美國基金會申請，不願採募捐方式籌款，甚至邀陳雪屏、羅家倫參與。「群以為此

事宜慎重，不可輕發動。」³² 另一方面，從郭廷以分別於16、18、19、21、22、23日記下李濟、劉子健，及自己於16、26日和王院長討論的要點和觀察心得，知道王明確表示政府當局對費不滿，擔心由費出名，對自己不利，且疑費別有用心，恐研究院受其牽制。郭廷以雖提出解決方案，但認為王「在政界太久，近年處境微妙，不甚得意，不敢放手作去也」。³³ 李濟的觀察是王「除政治顧慮外，實欲將此事併入其擬議中之中美科學合作計劃，算作自己成績」，批評王所見不夠慎重，近於官僚的想法，並憤慨研究院近年已衙門化；³⁴ 面對費正清募款事，李對王指責尤厲，郭記下：「李先生極不滿於王雪艇院長，謂其不知學術研究為何事，全為官僚作風。」³⁵ 劉子健則以局外人身分，在傳遞訊息、溝通意見的過程中，指出不妨照舊進行，若事情成功，王院長當不致推翻，這一想法和郭廷以相近。³⁶ 因此即使王院長於5月26日向郭廷以表示對費正清募款計畫暫不願進行，等秋後李濟去美再商，並責怪當初對此事一無所知，³⁷ 劉子健仍於6月1日致函費正清照計畫試行，³⁸ 並於8日向郭廷以表示各所如果態度一致，則院方麻煩自可減少，且表示曾向總統府張群秘書長說明院內情形，³⁹ 甚至在離臺前仍表示費正清的計畫照舊進行，將先和韋慕庭詳商，⁴⁰ 顯見他對此事仍抱持正面樂觀的態度，是以樂於在中美兩國與研究院內外之間，奔走協調。

費正清擬透過募款協助史語所、近史所研究發展

27 《郭廷以日記》，1964年5月11日，頁490。

28 《郭廷以日記》，1964年5月16日，頁492。

29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1964年5月12日，頁1036

30 《郭廷以日記》，1964年5月14日，頁491。

31 《王世杰日記》，1964年5月14日，頁1036。

32 《王世杰日記》，1964年5月26日，頁1038。

33 《郭廷以日記》，1964年5月16日，頁492。

34 《郭廷以日記》，1964年5月18日，頁492。

35 《郭廷以日記》，1964年5月22日，頁493。

36 《郭廷以日記》，1964年5月21日，頁493。

37 《郭廷以日記》，1964年5月26日，頁494。

38 《郭廷以日記》，1964年6月1日，頁496。

39 《郭廷以日記》，1964年6月8日，頁497。

40 《郭廷以日記》，1964年6月16日，頁498-499。

一事未能竟其功，王世杰院長的態度固然有一定的影響，但隨後爆發彭明敏事件，激起費正清不滿，憤而投書指責國民黨政府的處置作為，引發輿論風暴，更是導致講座案被迫中止的關鍵因素，此事拙文〈劉子健與近史所創立者郭廷以的關係〉有較詳細的說明，不擬在此重述。

(二) 中美科學合作與中研院人文學術發展

不過，從王、李、郭三人對講座案的討論與事後發展的過程中，更可以感受到王院長想藉此展現自己以院長的身份，擘劃研究院新的發展藍圖，改變研究院的生態。這從他向李濟表示「余意可向美國若干基金會申請研究講座，不宜採募捐方式」，⁴¹ 及李濟所說「實欲將此事併入其擬議中之中美科學合作計劃，算作自己成績」，⁴² 可以看到其用心。恰巧，費正清此次來臺的時間，正逢王院長召開「中美科學合作會議」。沒有參與費正清籌募基金的討論，讓王院長有充分的理由推動自己的想法。在此先介紹他與這個委員會的關係。

關於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與臺灣學術發展的關係，是瞭解臺灣學術發展的重要議題，涉及的機構多，層面廣，尚有很多值得發掘、探討的空間。目前所見，除張朋園教授在〈從臺灣看中美近三十年之學術交流〉一文有所介紹外，⁴³ 受命長期參與中美人文社會合作委員會運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且有具體貢獻的許倬雲院士，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曾就人文社會合作委員會的發

展過程和他的角色，做了相當詳細的說明。⁴⁴ 這二件文獻都是認識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與中央研究院發展的重要資料。不過，這二份著作都就整體發展的進程討論，並未參照郭廷以與王世杰的日記。而主要推動者王世杰在其《日記》對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人文社會合作委員會，及中研院人文學術發展有更豐富的記載，是了解臺灣學術研究及中研院人文學術發展方向轉折的重要線索；尤其對其中細節及轉變，與劉子健教授的角色，可補充上述二文之不足，本節僅聚焦討論與劉教授有關的部分。

中美科學界雖曾於 1960 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召開過「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但未見合作的事實。⁴⁵ 王世杰繼任院長後，於 1963 年 4 月曾宴請美國科學院谷勵杰（Harold Coolidge）博士及亞洲基金會代表，商討雙方建立關係的途徑。⁴⁶ 當年 7 月 26 日接獲美國科學院之邀，王院長代表中研院參加其百年紀念，⁴⁷ 遂於 10 月 14 日出發，21 日正式參與紀念慶典，24 日與科學院太平洋科學委員會主任及副主任磋商中研院與美國科學院合作計畫。⁴⁸ 王院長返國後，於 12 月 5 日召開中研院院務會議，通過與美國科學院合作案，⁴⁹ 並於 1964 年 3 月 23 日商議組織中美科學合作協會中國委員會，及與美方磋商合作組織與方案。⁵⁰ 其後並請劉子健任委員，於 4 月 14 日至 20 日正式召開中美科學合作會議，⁵¹ 開會時間適與費正清教授來訪撞期，因此王院長只於 4 月 1 日宴請費正清夫婦。⁵²

41 《王世杰日記》，1964 年 5 月 17 日，頁 1037。

42 《郭廷以日記》，1964 年 5 月 18 日，頁 492。

43 張朋園，〈從臺灣看中美近三十年之學術交流〉，《漢學研究》2: 1(1984.6): 34-38。

44 陳永發、沈懷玉、潘光哲訪問，《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頁 227-241。

45 張朋園，〈從臺灣看中美近三十年之學術交流〉，頁 34。

46 《王世杰日記》，1963 年 4 月 25 日，頁 992。

47 《王世杰日記》，1963 年 7 月 26 日，頁 1001。

48 《王世杰日記》，1963 年 10 月 14，頁 1008-1009；10 月 21、24 日，頁 1010、1011。

49 《王世杰日記》，1963 年 12 月 5 日，頁 1018。

50 《王世杰日記》，1964 年 3 月 23 日，頁 1030。

51 《王世杰日記》，1964 年 4 月 14-20 日，頁 1032-1033。參見《聯合報》，1964 年 4 月 12 日第二版。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會務雜件」（錢思亮）所見委員會名單中，劉子健與吳大猷、徐可燦均為顧問。見館藏號：303-01-01-07-007，頁 5。

這次會議通過中美各置科學合作委員會，以共同推進中美科學合作，及八點合作工作計畫，⁵³ 5月4日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5月18日王院長應總統府之詢問，提出六點具體方法，強調機構與機構之合作，並於27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時確定「機構與機構間之合作」。⁵⁴此後既向政府爭取經費，⁵⁵也與美方積極磋商合作計畫。⁵⁶1965年1月9日，王院長請錢思亮、李先聞、閻振興、吳大猷、郝履成為中國委員會的代表，出席在華府召開的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的聯席會議，⁵⁷同時也邀請已返美的劉子健參加；代表並於會後分赴紐約與舊金山，與旅美學者座談。⁵⁸為配合此次會議，王先於2月8日研討設置五個研究中心（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工程）的方案，後來還增加海洋研究。

不過，應邀出席的劉子健在4月27日給郭廷以的信中，除關心福特基金會申請案外，特別表達對此次華人人文學者出席相關學術活動的情況十分失望。他說：「中美合作事，想濟之先生已返（據雪艇先生來示）當有集議。健曉（？）感失望之一點，即此次在紐約、舊金山研會，並無其他院士列席；除濟之先生外，健乃唯一

華人。以健深感孤掌難鳴之苦。此默希以不露形跡之方式，為雪艇先生及其他方面當道言之；以院士不肯多奔走，則啟用年輕人來往兩國。健之竭力協助李國祁兄，歲手（？）抓襟見肘，即是為此。而向濟之先生建議將來派許倬雲兄訪美聯絡，然是此意。以先生與健相知最深，願排解縈思，互以勤忍相勉如何？」⁵⁹王院長可能也感受此一現象，乃於5月3日與6日向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及亞洲協會募款設置特別講座，以延聘在美的第一流科學家返臺。⁶⁰不過，在6月12日的科學會執行委員會中，李濟卻痛責若干留美有成就之中國學人，入外籍而不肯回國，讓王院長感覺李是反對他提議延攬海外學人的計畫，認為李的態度過於消極，「尤不免意氣用事」。⁶¹

中美科學合作計畫進一步擴及人文社會領域，對中研院人文組的學術發展方向是一大改變。1965年5月初，王院長接獲美國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團體來函，希望於7月來臺商量中美合作計畫，王院長即約李濟商議。⁶²唯王所記日期似有誤，⁶³依郭廷以日記，李濟於3日晚即與郭談及此事，二人並商量推動內容。⁶⁴5月11日李濟又與郭談此議題，且表達不滿王院長。⁶⁵

52 《王世杰日記》，1964年4月1日，頁1031。

53 《王世杰日記》，1964年4月19日，頁1033。

54 《王世杰日記》，1964年5月4日，頁1035；5月18日，頁1037；5月27日，頁1038。

55 《王世杰日記》，1964年6月3、5日，頁1039、1040。

56 《王世杰日記》，1964年6月13日，頁1040；6月16日，頁1041；7月1日，頁1042-1043；7月18日，頁1044；7月27日，頁1045；8月5日，頁1046；8月13日，頁1046；9月5日，頁1048；9月11日，頁1049；10月16日，頁1052；11月30日，頁1058。

57 王院長在1月9日與2月25日所記代表不同；正式會議代表有李濟，無郝履成。《王世杰日記》，1965年1月9日，頁1064；2月25日，頁1069。

58 《王世杰日記》，頁1069。代表赴各地座談事見下文劉子健信函。

59 「劉子健」(1962)，《郭廷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9-01-02-154。郭的日記亦記，見《郭廷以日記》，1965年5月1日，頁569。

60 《王世杰日記》，1965年5月3、6日，頁1076-1077。

61 《王世杰日記》，1965年6月12日，頁1081。

62 《王世杰日記》，1965年5月5日，頁1077。

63 王院長亦坦承日記「既非逐日有記，且常常事後經若干日始予補記」。《王世杰日記》，1965年3月24日，頁1073。

64 《郭廷以日記》，1965年5月3日，頁570。

6月21日，王獲知美國三個學術團體擬派代表來臺商議雙方人文社會科學合作計畫，先派戴德華教授（George Taylor）進行初步洽商。⁶⁶ 7月6日至10日，戴德華抵臺，商討華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意見。⁶⁷ 但郭廷以對戴來臺一事，所記特別詳細，如7月6、7、9及10日戴與臺灣人文學者討論重點，包括他和郭廷以二次討論及郭所擬具體合作意見，並記下戴德華對王院長誇耀自己一手促成中美合作計畫，頗有微詞。⁶⁸ 戴此行確定雙方合作方案，王院長為此特函請即將赴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劉子健，協助他在美聯絡工作，顯示對劉頗為倚重。不過，劉在函告郭的信中，表示王並未向他交待具體方案。⁶⁹

王院長希望趁中美科學合作會議，同時成立人文社會合作委員會，為此通知美方將原訂二月召開的第二次聯合會延期舉行，⁷⁰ 並於1966年1月13日和李濟詳商中美人文社會會議人選，旋即將合作計畫初案寄予美方。⁷¹ 不過，王院長對籌備期間所記甚少，也僅列郭廷以顧問而非代表，⁷² 但郭廷以卻相繼接到各方學者關

於中國經濟史及中國近代史的建議，⁷³ 讓王感受美方壓力，乃於4月21日請許倬雲將郭列為代表，⁷⁴ 30日正式確定。⁷⁵ 郭無意接受，且與李濟、許倬雲均對王的措置感到相當不滿，認為政治用意大於學術目的。⁷⁶ 但許倬雲、何廉相繼來勸解，⁷⁷ 韋慕庭亦函勸勿辭，⁷⁸ 遂接受代表之職。5月5日許倬雲談議事安排。⁷⁹ 張公權來函亦擔心人文社會會議不樂觀（頁644，5月7日）。5月10日王院長正式請郭就現代中國研究問題擬定方案。⁸⁰

6月1日韋慕庭來臺。⁸¹ 此時原負責與美方聯絡的劉子健因故未能與會，他於5月31日由普林斯頓專就美國學者對人文合作計畫關心的事項，寫了一封綜合意見，題為〈人文領域中美合作計劃：純屬個人想法〉的長信，供國內出席的友人參考。信中除了「指導原則」、「合作形式」外，更列出漢學、共產主義研究、臺灣研究及新興領域等四項合作主題。⁸²

6月15日至18日中美人文社會科學會議在臺北統一飯店正式召開，⁸³ 中方代表十人李濟、許倬雲、郭廷

65 《郭廷以日記》，1965年5月11日，頁571。又見7月1日及5日所記，頁582、583。

66 《王世杰日記》，1965年6月21日，頁1082。

67 王院長對此事記7月8日戴來中研院與他多次洽談，雖贊「彼甚熱心，惟似缺乏純粹學人態度」，且記於7月15日。《王世杰日記》，1965年7月15日，頁1083。

68 《郭廷以日記》，1965年7月6、7、9、10日，頁583-584。

69 《郭廷以日記》，1965年7月29日，頁588。

70 《王世杰日記》，1965年11月25日，頁1098；12月14日，頁1100-1101。

71 《王世杰日記》，1966年1月13日、1月18日，頁1106。

72 《王世杰日記》，1966年4月16日，頁638。

73 《郭廷以日記》，1966年3月31日，頁635-636；4月18日，頁639。

74 《郭廷以日記》，1966年4月21日，頁639。

75 《郭廷以日記》，1966年4月30日，頁641。

76 《郭廷以日記》，1966年4月19、21日，頁639。

77 《郭廷以日記》，1966年4月28、30日，頁641。

78 《郭廷以日記》，1966年5月3日，頁643。

79 《郭廷以日記》，1966年5月5日，頁643。

80 《郭廷以日記》，1966年5月10日，頁644。此後繼續討論涉及會議的事務，見5月17、18、22、24、25、31日，頁646-649。

81 《郭廷以日記》，1966年6月1日，頁649。

82 信件內容見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典藏號069-01-02-154中第10封信。《郭廷以日記》，頁651。此信於6月6日由凌純聲所長轉給郭廷以。

以、馬漢寶、李其泰、邢慕寰、施建生、姚淇清等，與美方代表有 9 人，經討論後，通過十項合作協議。⁸⁴ 17 日郭在與中國代表討論中，表示真正促成此會者其實是費正清，⁸⁵ 他的意見和許倬雲所說是契合的。從這二位實際參與者的口中，顯示王院長雖處處迴避費正清，費的實質影響卻不容抹滅。

會後，王院長於 8 月 8 日擬定委員會規章及人選。⁸⁶ 10 日，又與郭談中美人文社會合作中國委員會組織及工作。⁸⁷ 15 日王召開中美科文合作委員會，決設特別委員會，有執行委員 11-15 人，專理人文社會合作的重要事務，⁸⁸ 並提名李濟為執行委員會召集人；⁸⁹ 23 日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執行委員會議正式成立，由李濟主持，暫以古代史、近代史、經濟、法律等科為優先。⁹⁰ 9 月 21 日人文社會執行委員會商議分組及工作計畫，此時，郭認為計畫的規劃內容大都出於許倬雲、馬漢寶之手，與自己的想法有出入，決定今後不擬表示意見。⁹¹ 10 月 19 日中美人文會開會，郭被推主持教材編譯組。⁹² 11 月 5 日許倬雲、馬漢寶與郭討論大學教材的編纂問題。⁹³ 此後郭與許、馬商討中美人文合作事，⁹⁴ 並出席中美人文

執行會。⁹⁵

在王院長努力推動下，中美雙方就科學及人文社會的合作，都積極展開，因此他在 12 月 31 日與美方代表洽商合作方案及明年 4 月間中美科學聯合會議程時，記下三年來自己為中美合作奠定基礎，感到愉快。⁹⁶ 1967 年 1 月 1 日美國科學院向亞洲協會提議繼續並擴大中美科學合作的計畫後，⁹⁷ 王旋於 5 日與亞洲基金會代表商討繼續提供協助中美合作會議款項，並約六個研究中心主管交換意見，⁹⁸ 而於 3 月 22 日率團赴華府出席中美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合作會議。⁹⁹ 科學合作會 4 月 5 日召開第三次會議，7 日結束，8 日、9 日接著召開第二次人文及社會科學合作會議，中方參加者李濟、劉大中、許倬雲、馬漢寶、郝履成等，會中決議協助設立臺灣經濟所及籌設中美聯合研究機構。¹⁰⁰ 4 月 27 日王命其子王紀五起草致福特基金會，申請在臺設立講座，並親赴基金會拜訪，商討置講座事，提出 5 年 75 萬美元之計畫。¹⁰¹ 返臺後，更函請劉大中代向福特基金會洽商特約講座計畫，每人 1 萬至 1 萬 5 千元。¹⁰² 然而 5 月 11 日，他在中研院院務會議報告相關

83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6 月 15-18 日，頁 652-653。《王世杰日記》，1966 年 6 月 18 日，頁 1125。

84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6 月 15-18 日，頁 652-653。《王世杰日記》，1966 年 6 月 18 日，頁 1125。

85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6 月 17 日，頁 653。相關資料亦見頁 654-655。

86 《王世杰日記》，1966 年 8 月 8 日，頁 1130。

87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8 月 10 日，頁 665。

88 《王世杰日記》，1966 年 8 月 15 日，頁 1131。

89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8 月 18 日，頁 667。

90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8 月 23 日，頁 668。

91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9 月 21 日，頁 675-676。

92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10 月 19 日，頁 682。

93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11 月 5 日，頁 686。

94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12 月 16 日，頁 694。

95 《郭廷以日記》，1966 年 12 月 22 日，頁 696。

96 《王世杰日記》，1966 年 12 月 31 日，頁 1146。

97 《王世杰日記》，1967 年 1 月 1 日，頁 1147。

98 《王世杰日記》，1967 年 1 月 5 日，頁 1147。

99 《王世杰日記》，1967 年 3 月 22 日，頁 1158。

100 《王世杰日記》，1967 年 4 月 5、7-9 日，頁 1161-1162。

101 《王世杰日記》，1967 年 5 月 1 日，頁 1166。

102 《王世杰日記》，1967 年 5 月 16 日，頁 1168。

計畫時，李濟卻不贊成，反而強調中研院今後的工作應注重基本學科，不宜涉及應用學科，儼然是對王院長計畫方向的抗議。¹⁰³此時，在普林斯頓任教的劉子健既忙於教學，又感於對中美人文合作，難以發揮角色，遂於1967年5月2日正式請辭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職務，此後未再參與相關事務。

另一方面，王院長則按中美人文社會合作會議的決議積極推動。如籌備「臺灣經濟發展會議」，¹⁰⁴6月19日至23日在國賓飯店正式召開。¹⁰⁵此會甚受政府重視。¹⁰⁶7月15日正式商議起草福特基金會申請設置特殊講座，五年共需一百餘萬美元，¹⁰⁷並期能運用外國私人基金設置50個特別講座來臺訓練博士學位。¹⁰⁸11月13日，福特基金會函告未能接受設置講座之申請。¹⁰⁹到次年，由於新任國科會主委吳大猷並不重視中美合作計畫，以致他擬透過福特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設置講座一事來取代費正清私人募款的願望，未能實現。¹¹⁰然而他親自規劃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學術發展方向，即在既有基本學科之外，開展了與現實環境相關的應用科學政策方案，成立經濟學研究所及美國文化研究所，且由小宗蔚為大國，無疑是中研院人文學研究方向改變的重要里程。

五、劉子健在史語所的活動與學術成就

1963年劉子健教授獲得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的資助，到中研院史語所擔任為期一年的訪問學人。（以「宋代行政難題」為題執行研究計畫）他在史語所報到的登

記表上，寫填表到院方的時間是「五三年五月廿日」，「五三」可能為「五二年」之誤；或係民國五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前抵臺，五十三年（1964）六月三十日離臺。同行者有夫人王劉惠箴博士和女兒劉愷倫二人，住於蔡元培館。此時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剛落成不久。¹¹¹其所藏圖書的數量和品質，與提供閱讀、研究的服務條件，當時在臺灣是首屈一指的，這對宋史研究論著成績卓著，且在研究方法開闢新見的劉子健來說，既利於廣覽群書，又能廣交群賢，乃至培育新秀，確能展布雄才的絕佳環境。

此時史語所整體學術成就，早已享譽學界；學術領域十分寬廣，研究同仁各自在專業領域耕耘，研究成就卓著，可惜沒有專研宋元史的研究者，缺乏可和劉教授對話的對象，是美中不足之憾。但新成立的近史所則亟需開闢視野、培養新秀，及爭取國外資源，深化研究；同時研究院本部正逢王世杰院士繼胡適之後擔任院長，亟待開拓、擘劃研究方向。值青壯之年的劉子健已是名校教授，不僅語言能力、識見與溝通能力俱優，而且熟悉歐美學術風格，正是協助近史所所務及院務開展，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這一年他名義上是史語所的訪問學人，卻頻繁受邀參與中研院近史所，乃至院外研究教學活動，且與當時學、政機構主管密切往來；他們對他的學術熱忱及溝通長才十分欣賞，因此他參與活動的事蹟多見於郭廷以和王世杰所留的日記，及若干學界同道的回憶錄中。反而在他主要訪問的史語所，留存的資料、文獻並不多，是以本文僅就目前搜集所得資料，進行零散敘述。

103《王世杰日記》，1967年5月11日，頁1167。

104《王世杰日記》，1967年5月19日，頁1169；6月2日，頁1171；6月18日，頁1172。

105《王世杰日記》，1967年6月19、23日，頁1173。

106《王世杰日記》，1967年7月14日，頁1176。

107《王世杰日記》，1967年7月15日，頁1176。

108《王世杰日記》，1967年7月31日，頁1178。

109《王世杰日記》，1967年11月13日，頁1191。

110依現有資料顯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僅於1966年在史語所設置二項講座，至2004年停辦。見李貞德主編，《慶祝九十五周年史語所檔案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23），頁290。

111傳圖建於1960年6月，由胡適院長命名，於1961年6月落成啟用。見李貞德主編，《慶祝九十五周年史語所檔案選輯》，頁289。

劉子健教授到史語所訪問前，已出版二種專書，一是 1959 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王安石》一書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及 1962 年在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的《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另還有 8 篇論文。在史語所一年又分別以中、日、英文發表了 6 篇論文，其中除了 1964 年 3 月 17 日在史語所講論會報告的「宋代行政難題—初步的設論」改寫後發表於《大陸雜誌》外，其他 5 篇涉及的方面都很廣泛。¹¹² 史語所因其卓越的學術成就，於 1964 年聘他為通訊研究員（與他同時來訪的李田意教授也獲聘），這是學術界很高的榮耀。但到 1971 年中美建交後，他因參與美國華裔科學家訪問中國，而於 1973 年被中止續聘，¹¹³ 此事顯然與當時兩岸敏感的政治因素有關。

1964 年 6 月 30 日劉教授離臺返回史丹佛大學前後，與史語所的聯繫資料極少，目前僅見二事：一為 1964 年秋天劉教授赴歐洲開會，於 9 月 6 日從法國寄了一張明信片，向史語所同仁問候；信中提到參加歐洲漢學年會時，「有機會總會提一下所裡的研究進展。這次會況不甚精彩，倒是遇見一些久在歐洲的中國人」。另外是他曾透過屈萬里教授，請屈的學生「譜有宋一代文獻」的程元敏先生，協助編集宋人著作書目，¹¹⁴ 可見他離臺後和史語所仍有所聯繫。

但有一件歷史學界長期存疑的問題是，以劉子健教授在宋史研究的卓越成就，何以未能成為象徵學術桂冠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有人懷疑是否 1971 年他是首批訪問中國的旅美學者，被視為投共學人而未獲提名，但此事甚為敏感，不好直接問他，他也未明說，曾被視為公案。到他晚年，才向後學談及此事。1988 年到普林斯頓大學進修的梁庚堯教授，在《遊學記聞》的筆記中曾記下劉教授親口提及婉辭院士提名的事；當時在場的尚

有朱鴻林、王汎森、戴仁柱和王貞平等教授。梁教授記劉教授所述的內容是「民國 52 年，李濟先生曾經寄表格給他填，但他認為，第一應多推選國內學者；第二，錢穆、洪煨蓮兩位先生還沒有成為院士，所以他推辭了」。¹¹⁵ 但除梁教授記下親聞之外，一直未見具體文獻。

2023 年我擬探討劉教授來臺協助推動學術發展時，知道他與史語所關係最密切，學術研究也備受肯定，乃積極查詢與此事相關的訊息。2024 年秋，得知史語所檔案室藏有二件劉教授的資料，經實地檢視發現，除前述劉教授於報到時親筆填寫的文件外，更難得的是他於民國 55 年 4 月 9 日，從普林斯頓大學致函史語所，懇辭第六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之推薦。劉教授信件的內容是：

史語所同仁大鑒：別來瞬將兩載，時念南港高誼。祇以事冗，未能一一致候。伏維寬諒，來茲面敍。茲有陳者，近將提名候選院士，傳聞謂或以弟列入，並擬來索歷年蕪筆全部。仰蒙先進垂愛，衷心曷勝愧感。然事關原則，斷難應命。已兩度函請 諸先進道謝，並聲明微意，堅懇撤銷提名。謹再為

諸君子陳之，仰祈明鑒，並予響應支援，以固立場。

誠以名器未可輕授，弟言行尤應相符。嚮在所時，已有主張。提名院士候選，必以國內學人為先。此體統所關，抑亦固本之道。在自然科學，迫於海外之日新月異，容可從權。而人文科學，又何必如此。現有院士，自胡先生主持院務以還，已成內輕外重。春秋又何責賢者，顧亦不當一誤再誤。此區區之原則，故雖承 先進謬獎，必期期以不可。至於僑久學疏，猶其餘事也。其

¹¹² 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刊行會編，〈劉子健博士著作目錄〉，收入《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頁 10-12。

¹¹³ 這在史語所是有案可稽的，參見李貞德主編，《慶祝九十五周年史語所檔案選輯》，頁 294。

¹¹⁴ 屈萬里，《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2)，〈安慰屈翼鵬夫人——費海瑾女士的信——費海璣〉，頁 255。

¹¹⁵ 見 1988 年 11 月 11 日梁教授所記未刊布的打字稿。承梁教授賜贈，十分感謝。

按學術慣例，先擬提名，而後收集所刊，似或未妥。若按民主原則，列個人不同意，自應撤銷。
臨風謹佈，順請 研安

弟 劉子健謹啓 五五年四月九日

於卜林士屯大學

這封信的內容可以清楚證實梁教授所記劉教授被推薦為院士候選人一事，唯所述時間有出入。¹¹⁶ 劉教授提及的民國 52 年，殆為 55 年之誤，是他離開史語所近二年，且已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之時。至於信中未提及錢穆和洪業二位享有盛譽的學界前輩，當屬劉教授内心考量，未於信中明示。

以劉教授所撰的學術論著而言，在 1966 年以前，除了以王安石（英文）和歐陽修（中文）為題的二本專書外，比較重要的論文共有 16 篇，即於 1964 到 65 年二年間，分別以中、日、英文發表八篇論文，研究議題多元且多有創見，是國際宋史學界重要領軍人物。有這樣專業的學術成果，獲得史語所大老的肯定進而推薦，顯示他的學術成就獲高度肯定。關於本屆院士選舉的作業時程，王世杰院長日記所載可為佐證，當年 4 月 24 日是選舉院士候選人的時間，顯然是史語所先進經慎重考慮後，請劉教授提供學術著作，以備推薦。劉教授在致史語所的信件中，則強調他已二次謙辭，未能如願，特別在推薦截止前，再次表達，並請事務同仁將此封信公開張貼於佈告欄以明確表示態度，並懇切呼籲提名國內學者為先；亦不贊成先提名再收集研究論著的方式，堅決表達個人不同意，自應撤銷的心意，態度頗為明確。以

此類選舉而言，他當不清楚其他可能被推薦及候選者是誰，顯然是發自內心的。這封信不僅釐清了所有疑惑，更可以見識劉教授在能力、識見、才華之外的風範。

這一屆在 4 月 24 日選出 18 位院士候選人，¹¹⁷ 到 7 月 24 日正式當選 8 名院士，其中人文組有何炳棣、邢慕寰和高去尋。¹¹⁸

六、結 語

劉子健教授在青壯之年到臺灣的學術之旅，雖然為期不長，但以其卓越的才學和樂於助人成事的個性，及善用人際資源與協調溝通能力，對正待開拓國際關係、增強研究資源，提升研究能量的臺灣人文學界，特別是中央研究院和臺灣大學兩個研究、教學重鎮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助力。由於其傑出的表現，受到政、學界及媒體的高度重視，分別記錄其參與的事蹟及發揮的貢獻。雖然目前從劉教授留下的少數文獻資料，很難完整掌握他在臺的活動及表現，但經過多方查找、蒐集相關人物的記錄，可以清楚呈現他在臺灣早期人文學術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誠如他在給許倬雲的信中所說：「我最好的貢獻是透過跟美國人工作，更為有利。」其中固然有部分事務未能竟其功，但他不計得失，熱切謀事的精神，令人讚佩。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回應被推薦為中研院院士候選人時，強調本土優先的觀點，絲毫沒有國外傑出教授的優越感。其推辭的另一個理由—尊崇他的老師洪業和國學前輩錢穆，則表現他謙沖的風範及堅持學術標準的態度，而且此後絕少提及此事，顯示他豁達之心胸，此一風範著實令人感佩。

¹¹⁶ 原件可見附錄一。

¹¹⁷ 《王世杰日記》，1966 年 4 月 24 日，頁 1120。

¹¹⁸ 《王世杰日記》，1966 年 7 月 24 日，頁 1128。

研究綜述

附錄一 民國 55 年 4 月 9 日 劉子健致史語所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館藏，流水號：08212）

(請放在黃南編後先生內通訊類下)

史語所同仁大廳別來辭將兩載時念南歸
高論流連未終一致戾於誰窮諒來殊無穀非有
陳者近將提名候選院士傳聞謂或以列入並擬來索歷
年纂筆金評仲蒙先進垂愛衷心昌勝譽國然事
關原則斷難應命已兩度函請諸先進道謝並聲
明微意堅誓撤銷提名謹此為
諸君子陳之仲祈明鑒並予賜教援此固立協
誠以名器未可輕授第書劄尤應相符嚮在所時已有之
臨民德順付研安
劉子健謹啟
民國五十五年四月九日

附錄二 1963 年劉子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人登記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秘書室藏，人事舊檔 02/2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訪問學人登記表 Visiting Scholar Form		
1. 姓名(中文): <u>劉子健</u> (英文): <u>Liu Zijian</u> (別號): <u>T.C.</u> 2. 生平月日: <u>1912年7月7日</u> 性別: <u>先生</u> (夫人) Date of Birth: <u>July 7, 1912</u> Sex: <u>Mr.</u> (Mrs.) Miss		
3. 同行眷屬: <u>二</u> 人: <u>妻子</u> (妻或夫) <u>子</u> 人: <u>4</u> (女) 人 Family Persons: Wife or Husband Son Persons, daughters Persons 4. 國籍: <u>美國</u> 出生地: <u>中國廣東</u> Nationality: Place of Birth:		
5. 通訊處: <u>History Dept.,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u> Address:		
6. 學歷: <u>清華大學畢業, 諸葛寧波肄業, Pittsburgh 大學</u> Education:		
7. 現任職務: <u>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ommittee Chairman</u> Present Position:		
8. 任職機構: <u>Stanford University</u> Institution:		
9. 研究興趣: <u>宋史</u> Field of Interest:		
10. 研究計劃: <u>宋代理學研究</u> Research Project:		
11. 研究期間: <u>一年</u> Length of Stay:		
12. 經費來源: <u>美國王華教育基金會</u> Financial Arrangement:		
13. 推薦機構: <u>U.S.A.</u> Recommended by:		
14. 重要著作: _____ Publications:		
15. 特註: _____ Remark:		
填表日期 <u>1963年4月9日</u> 填表人簽名: <u>劉子健</u>		
尺寸 190x275 公厘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底印制		